

小说中的权力与稳定： 社会符号学视野下的小说体裁研究

方小莉

摘要：文化领域的斗争可以说是争取意义的斗争。代表不同利益的集团均试图生产出符合自己利益的意义并将其自然化，使之成为整个社会普遍认可的常识。小说作为社会权力和稳定性的表征，也成为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争夺意义的场所。本文从社会符号学理论的视角切入，通过对小说的兴起、小说的体裁特征、小说中权威的解构与建构等方面的研究，探讨小说对社会权力与稳定性的再现。

关键词：小说；权力与稳定；解构与建构；社会符号学

根据不同的社会属性的界分，文学艺术被归类为不同的体裁。“体裁作为一个符号学范畴对社会变化以及社会斗争所产生的作用进行编码。可以说，每一种体裁，都对社会参与者之中存在的‘特定’关系进行了编码。”^①文学艺术中不同的体裁都以它的文类方式，生产出统治阶级的权力，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改造着统治阶级的话语。因为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它必然与权力生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伊格尔顿指出意识形态内部的差异和斗争，主张“意识形态保证了统治权力的再生产，但其内部的分歧也在分解着统治权力”^②。那么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艺术也一方面生产出统治阶级的权力，同时文学艺术中存在的各种差异和斗争，从某种程度上又分解这一统治权力。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道利莫尔主张颠覆性虽然可能被统治阶级的权力容纳，但是文化中“从属的、边缘的不同成分也可以挪用、改造统治话语”^③。

文学艺术在生产意义的过程中，生产出了统治阶级的统治权力，并将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意义合法化为整个社会文化中的正项，获得了为社会的中间项代言的权力。与统治阶级利益相对的意义则被正项与中间项边缘化为被标出的异项。在意义的生产过程中，正项由于获得代表大部分人价值取向的中间项支持，因此成为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异项则被标出，其代表的价值取向则被整个社会边缘化。然而由于正项、中间项、异项的相互依存性，异项也不能完全被消灭，否则整个社会的平衡将会被打破，因此文学艺术内部存在各种冲突和斗争，异项也以自己的方式挪用并改造统治话语。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产物也体现了社会的权力与稳定性。本文从社会符号学理论的视角切入，通过对小说的兴起、小说的体裁特征、小说中权威的解构与建构等方面的研究，探讨小说对社会权力与稳定性的再现。

一 小说的兴起

小说这种体裁的兴起正是社会变化及社会各种力量之间斗争的结果，它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发展与中产阶级力量壮大的结果。小说从诞生之日就代表着中产阶级的审美趣味。随着中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小说在19世纪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审美价值观。

18世纪读者的变化是小说兴起和发展非常重要的原因。许多18世纪的观察家认为“这个时期是一个公众阅读兴趣异常突出而且不断增长的时代”^④。当时的公用图书馆迅速成功可以佐证人们对阅读的渴望。当然，需要注意的是，阅读大众却并非是指全民，而仅是指那些具备阅读能力而又有经济能力的民众。现有的研究则表明，18世纪读者大众增多的主要原因是中产阶级的变化。

对于下层劳动人民来说，他们既无读写能力，也无力负担小说昂贵的费用。同时，传统的观点也认为，“阶级差别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业余消遣只适合于有闲阶级，因此反对把劳动人民从他们的繁重工作中解脱出来。”^⑤因此下层阶级无法构成小说的阅读大众。对于贵族阶层来说，小说区别于许多业已确立的、高雅的文学形式，因此难登高雅之堂。所以小说诞生之时，并非是一种大众化的文学形式，它更多的是符合中产阶级的阅读兴趣和经济能力。

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分工的专门化使新兴的资产阶级的闲暇时间增多。个人主义孕育而生，社会开始关注个人的经验、感知和价值。这些使小说这种关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文学体裁成为可能。小说代表中产阶级的审美价值，所关注的重点也是中产阶级的兴趣所在。中产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使读者大众的重心发生了变化，从而削弱了“那些饱读诗书、时间充裕、可以对古典和现代的文学保持一种职业性或半职业性兴趣的读者的相对重要性”^⑥。这

样一来,小说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而小说所代表的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也不断得到书写与传播。可见小说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体裁,它的诞生与发展,反映了社会权力的变化以及社会各种力量之间的斗争。

这种斗争不仅是一种文化斗争,也是一种政治权力斗争。或者更精确地说,是通过文化斗争而实现政治权力的建立。从符号学角度讲,“符号意义必然是一种交往关系”。^⑦文化中的一切都可被看作一种交际形式,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必然涉及到符号意义的交换和争夺。在文化场域中,各阶级在交流中生产各自的意义,因此可以说文化中的交流既是意义的交流也是不同意义之间的斗争。那么文化领域中声音权力的斗争是“争取意义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主导阶级企图将服务于自身利益的意义‘自然化’,使其变为整个社会的‘常识’;而从属阶级则利用各种办法,在不同程度上抵制这一过程,并且努力使意义服务于他们自身的利益”^⑧。这种争取意义的权力斗争在文学中则表现为主流文化采用自己的文学形式和言说方式生产出符合自己利益的意义,使其成为被整个社会认可的文化、体裁,从而实现其意识形态政治意义;而那些被压抑而寂然无声的亚文化群体也采用其相应的特殊形式试图在主导话语内部生产出自己的意义,从而与主流文化形成一种权力协商,以争取最大化地表征自己的意义。由于“文化符号学的主要问题是意义的生成问题”^⑨,本文接下来主要从文化符号学的视角来探讨小说这种典型体裁中意义的生成和权力斗争。

二 权威的解构:作为反权威声音的小说

从小说作为一种体裁来看,与其它体裁相比,“小说是局外人,它与其它文类和‘诗学’(传统文学理论)特有的规则相对立。”^⑩与诗歌、戏剧这些传统的文学形式相比,小说作为一种新兴的文类,从诞生之日开始,就缺乏严格的规则,没有诗歌的“韵”的要求,也没有戏剧“三一律”的标准……由于缺乏严格的规则,小说一直以来也难于定义。小说的创作由于缺乏严格的规范,因此也使得该文类跳出了文学精英的标准。虽然最初不容于少数的精英文化,但却迎合了新兴的中产阶级的阅读兴趣,从而得到迅速发展。可见,小说作为一种文类本身就是对传统的反叛,是作为反对声音而存在的。它与诗歌、戏剧这些严格遵守文类规范的文学相异,它完全不遵守所谓的现有规则,它的存在本身就显示了不同规则的冲突、不同价值的对抗。“当批评家将其各种规则加以法规化时,小说家却通过滑稽模仿,或是创作新的形式而与这一‘小说规范’作对。”^⑪

从小说的内容和题材来看,很多批评家认为小说是“生活全部多样性的表现。由于脱离了老套的形式和虚假的情境从而获得了生命”^⑫。小说被认为是对社会现实的刻画,它的兴起使文学的内容和题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作品的选材不再局限于讲述神、英雄、贵族的故事或是表达上层阶级的观点。它结束了“文学把贵族之外的一切人物都

描绘成粗鲁的、滑稽的或不值得认真看待的”^⑬时代。由于个人主义的兴起,社会开始高度重视每一个人的价值,个人成为了严肃文学的合适主体,^⑭因此小说开始深切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严肃对待普通人的个人经历。小说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表现生活,它“力图描绘人类经历的每一个方面,而限于那些适合某种特殊文学观的生活”^⑮。由于要全面表现生活,小说不得不描写那些“在公认的价值体系中没有一席之地的人与环境,从而使现有的价值体系受到潜在的怀疑”^⑯。也就是说在反映主导阶级价值的小说中,也会引入在该价值体系中没有一席之地的从属阶级的思想与价值取向,从而使另一种价值得以呈现。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克服了以往文学中对单一价值体系的呈现。作为对生活相对全面刻画的小说,它的选材和内容呈现了各种不同价值体系、不同思想的相互碰撞与斗争,同时也就体现了各种不同意义之间的冲突。

从表现形式来看,“长篇小说是用艺术方法组织起来的社会性的杂语现象,偶尔还是多语种现象,又是个人独特的多声现象。小说通过社会性杂语现象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个人独特的多声现象,来驾驭自己所有的题材,自己所描绘和表现的整个实物和文意世界。”社会性杂语借小说中的“作者语言、叙述人语言、人物语言等”进入小说,构成一个统一体。^⑰“这些社会性的各种语言并不是用规范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抽象的系统,而是用杂语表现出的关于世界的具体见解。”^⑱因此不同的语言中渗透着各种不同的意识与观点。不同声音间的对话即是不同意识、观念之间形成的一种相互对话、相互斗争的关系。小说是由多种社会声音、意识和观念构成,这些不同的社会声音之间相互对话、相互斗争从而生产出文本的意义。小说的多声部现象天然是对唯一权威的解构。从小说本身的形式来看,小说家允许各种声音进入自己的文本,这些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识、不同的观念之间相互对话形成一种多声部共存的状态从而解构了单一声音的霸权。

三 权威的建构:作为权威声音的小说

上文分别从文类、内容与题材和表现形式三方面阐述了作为一种反对声音的小说对单一权威的解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小说通过一种权力协商,在解构一种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权威的同时也是对一种新权威的建构。

从文类来看,小说作为一种新文类,不遵守任何既有的规则。但所谓无规则也是一种规则。可以说小说的规则就是不遵守任何规则。它融合了诗歌、戏剧等文学的特点,用自己的无规则建立了属于自己独特文类的规则,并使之流行起来。不得不说小说在不断地发展中建立了其独特文类的新权威。这一文类一旦被新兴的中产阶级掌握,就成为了他们反对旧有的单一权威而重建新权威的武器。由于小说读者的不断扩大,小说的发展与其所代表的价值观也对传统的文学形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到19世纪,英国迎来了小说繁荣的时代,而小说所代表的中场阶级审美趣味也

成为了该时期的主导审美价值。可以说小说在推翻旧有的权威体系的同时,也在试图建构属于自己特殊文类的新秩序。因此主导阶级也不得不重视小说的影响,无法固守所谓的传统,因此在新旧文类的斗争与协商中,原来的贵族阶级也不得不借用小说这种形式来试图巩固和重建自己新权威。因此小说在解构权威的同时,也是对新权威的建构。

由于小说容纳了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小说的诞生使得主流意识形态以外的价值体系也获得了发出声音的机会。小说力图表现生活的全貌,其内容和选题本身决定了小说不仅能够阐发言说者的价值观,它同时也使得与言说者相对立的价值观得以呈现。在小说中,一切类型的人物、主题等都可以被认真对待而不被阶级或文体所隔离。值得注意的是既然小说试图再现生活的所有方面,那么一方面主导阶级虽然在小说中不得不引入各种不同的价值观,但最终他们会以符合本阶级利益的内容和题材来容纳各种不同的观点,从而使自己的价值观得到最大的体现,因此小说在解构唯一权威的同时,也是对权威的巩固和再次建构。小说诞生时,以中产阶级为主要受众,为读者的闲暇时间提供了消遣,同时由于受众的不同,小说主要代表中产阶级价值观。因此即使出于体裁的要求,小说需要全面地表现生活,但是其重心却是以中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为导向。随着社会的发展,读者大众的变化以及社会各种力量间的斗争,小说不再只是中产阶级的代言人,不同阶级生产的小说也均如是,他们也同样试图讲述符合自己阶级利益的故事,选择相应的故事内容和题材,在质疑和揭露主导阶级的统治权力的同时,建构属于自己的权威,将自己的意义合法化。

从表现方式来看,小说虽然容纳各种话语,但是文本中代表不同阶级和意识形态的个人依然会以特定的话语为自己的阶层发言。文本中掌握话语权的阶级使用适合某一群体的言说方式和态度阐发符合本阶级的价值观,诱导目标读者按照他们的方式来阐释文本意义,从而从属于他们的权威。因此可以说,小说中虽然允许杂样语言存在,不同语言也体现了不同的意向从而构成了多声共存的现象,但是在这一多声共存的小说中,必然有一个主声部,这一主声部则生产出文本的主题意义,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同时也折射出某一利益集团的权威意义。

从小说的文类、题材和表现方式各方面来看,小说文本体现出解构与建构权威的双重性。小说是争取意义的权力斗争的场所。在这里各种声音间的相互斗争最终服务于生产文本的主导意义。主流文化的小说家允许从属阶级的声音进入自己的文本,经过各种声音的对话、协商,最终生产出符合自己利益的文本意义,从而巩固了自己的主导地位;而亚文化的小说家则在引入主导阶级的权威声音的同时,通过斗争生产出自己的文本意义,从内部解构主流文化霸权并建构自己的权威。可见小说既是对权威的解构,同时也是对新权威的巩固与重构。例如在代表主流价值观的《失乐园》中,弥尔顿的写作目的是为了赞颂上帝,巩固其主宰地位;然而在该作品中,弥尔顿也让撒旦的声音进入文

本,并让其发表了革命英雄主义的战斗宣言,然而撒旦最终也不得不被打入无边地狱。与之相反,在《简爱》中,主人公简(Jane)代表了下层社会女性亚文化的价值观,而罗切斯特(Rochester)则代表上层社会男性主流价值观。在整部小说中,这两种价值观一直在斗争与协商,正当简决定嫁给罗切斯特,似乎要宣告亚文化价值观被容纳的时候,作者却一把火烧掉了主流价值体系的殿堂,从而使标出项得到了翻转。可见从小说对权威的解构与建构的双重性来看,任何阶级只要掌握小说这种文学形式都可以为我所用。

四 小说中的权力、稳定与标出性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小说中同时体现了权威的解构与建构。小说的这种双重性体现了权力与稳定性的相互作用。在当今社会,为了维系一种稳定的统治结构,“统治集团试图用反映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权力利益的形式来表现这个世界。但同时,他们也需要维系作为其统治条件的稳固关系。被统治阶级并非总是处处无法看到对这些统治结构的运作。”^[10]统治阶级通过自己的表意方式,生产出符合自己利益的意义,并将这种意义常识化,使之成为文化所认为的“正常”,因此也就成为了“文化中的正项、非标出项,获得了为中项代言的意义权力”^[11]。而与其相对的价值和意义则因得不到中项的偏向而被边缘化成为了被标出的异项。“有意把异项标出,是每个文化的主流必有的结构性排他要求。”^[12]通过将异项边缘化,统治阶级让自己成为稳固的主流。然而,被统治阶级有时也会竭力反抗,并在社会交锋中获取某种胜利。这样一来,正项与异项之间的斗争就成为了争夺中项的斗争,看谁能够赢得中项的偏向从而成为正常的非标出项。社会的稳定就依赖于中项认同于胜利的正项。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同属一种文化的大多数人与他们认同的意义项合起来构成非标出的主流。它一方面必须排斥异项,以保持、巩固自己的主流地位及权力,使自己意义的有效性实现最大化,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容忍非标出项从而维系社会的稳定。权力很少以公开、武力的方式呈现,而是让被统治者在不知情的基础上赞同统治者的逻辑,这就是布迪厄的“符号权力”可以实现的意识形态意义。统治阶级当然可以通过直接的武力来维护统治,但权力的实现更多是通过稳定性符号的在场以及权力符号的退场而实现。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意义的实现也是如此,当然与正项相对的标出项也很可能“自觉维持标出性形式特征,避免被主流吸纳”^[13]。无论采用何种方式,“稳定性是权力产生的效果,正如权力是稳定性所产生的效果。”^[14]正项与异项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妥协,共同维护着整个社会的权力与稳定。

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由于其特有的文类特征,有效地生产出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同时也从内部改变统治阶级的话语权威。小说力图表现生活的全貌,是一个多声部共存、各种价值与观点交汇的场域。在小说所建构的虚构世界中,来自各个不同阶层的言说者都被打上各个阶级的烙印。

在文化交流中,他们试图通过自己不同的言说方式生产出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意义,并使之成为被大多数人所认同的正项。然而同时作为正项,为了维持权力与稳定性,他们不可能将与自己相冲突的标出项完全排除出自己所建构的体系或是虚构世界,因此与其相冲突的声音、价值观也被小说的虚构世界容纳,但却被边缘化,成为了标出项。因此小说文本容纳了各种声音、各种观点和各种意义,但是整体上却最终也能引导读者读出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文本意义,因为统治阶级的意义在文本中通过放大而得到表征,而被标出的意义却被缩小甚至是删除而受到压制。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小说这种文学形式,一旦由被统治阶级掌握,他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言说方式,对统治阶级的权力进行挪用,从而在统治阶级内部形成权力协商,改写统治阶级的话语,并实现自己的意义。

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要实现自己的意义及意识形态目的必须要采用相应的策略。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统治阶级要实现、巩固自己的权力,通常不会明目张胆地使用公开武力,而是以符号权力的形式,让被统治阶级赞同自己的统治逻辑,从而使权力合法化。在文学艺术中,统治阶级要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最有效的方式不是在文本中无限放大或罗列统治阶级的权力能指,而是让权力能指退场,通过表面的稳定性来诱导被统治阶级在不知情的基础上同意其权力的合法性。

笛福最具有代表性的两部小说应该是《鲁滨逊漂流记》与《摩尔·弗兰德斯》。两部小说总体来说都生产出了资产阶级的权力意义。不同的是,《鲁滨逊漂流记》更多的是权力能指的最大化呈现。作为资产阶级代表的鲁滨逊在荒岛上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设立了自己的统治秩序,殖民了星期五。统治者在被统治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实现了统治阶级的权力。今天在文学界,众多批评家认为《摩尔·弗兰德斯》的艺术成就远高于《鲁滨逊漂流记》。与《鲁滨逊漂流记》不同,《摩尔·弗兰德斯》对统治阶级权力的生产是通过权力能指退场,文本呈现出的权力稳定性而实现的。

由于经济发展,社会分工以及科技的进步,18世纪中产阶级或是贵族阶级的女性的闲暇时间增多,再加上她们不被允许参与男性的社会活动,因此读书就成为了一种正当的休闲娱乐活动。由于女性读者的增多,女性经历也必然会被引入小说中,这也催生了18世纪的家庭小说、言情小说等文类的发展。然而女性经历及价值观在一个以男性价值为正项或是衡量标准的世界中必然是被标出的异项。不过主流意识形态为了维护权力与稳定,不得不对采取排斥又容忍的态度。

《鲁滨逊漂流记》关注男性经历,《摩尔·弗兰德斯》则是关注女性经历。在一个男权社会中,对女性经历的关注成为了稳定性的透明能指,显示了社会对男女价值观念、经验的同样重视。小说采用女主人公第一人称来讲述故事,赋予了女性话语权。作为权威力量的男性声音缺场不仅表示了稳定性,也似乎是女性权力彰显的透明能指。有的批

评家甚至认为《摩尔·弗兰德斯》是早期的女权主义作品的代表。然而这个看似以女性经历为中心的文本生产出的却是男性为中心的意义。首先笛福在小说的前言中申明:“小说用第一人称讲述了一段真实的人生。但为了娱乐性与适当性的原因,编辑对该故事进行了些重写。”^[2]可见小说中读者并非只听到摩尔一个人的声音。女性讲述故事在娱乐性和适当性方面都遭到质疑,从而必须要一个“男性”编者来对此进行审查和改写。男性编辑显然成为了小说文本中男性权力的透明能指。当然很快,这个男性声音在故事开始时退出了文本,权力的透明能指缺场,小说表面重新恢复稳定性,但是男性的权力在此时早已得到放大和巩固。从小说的具体内容来看,《鲁滨逊漂流记》中的男主人公被隔离到一个孤岛上,他用自己的智慧、勤劳、勇敢等男性品质,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王国,从而成为了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反观《摩尔·弗兰德斯》,作为一个女性,如果她在婚姻市场失败,就只能沦为妓女和小偷。因此表面以女性经验为中心的小说,却是将女性边缘化为社会的异项,她必须要依存男性才能成为社会的主流。在男性权力能指退场的情况下,小说文本依然能够将异项的经历边缘化,女性经历被标出也被容纳。

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统治阶级的权力运作并非是不透风的墙。被统治阶级也有识破统治阶级的霸权生产的时候。与统治阶级相比,被统治阶级要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监管下实现意义的合法性或是挪用统治阶级的权力意义更为困难。因此被统治阶级或是说被社会标出的异项更为有效的方式是让代表统治阶级权力能指在场,以表面的稳定性来实现自己的意义。这样的一种方式,一方面让统治者看到其权力的在场从而放松警惕,另一方面被统治者也可以从侧面揭示统治阶级的霸权,从而在统治阶级内部形成意义协商,挪用统治话语,并改造它们。

小说这种体裁具有解构与建构权威的双重性,使得任何阶级都可以掌握它从而成为本阶级生产意义的武器。那么作为异项的女性,也可以用自己特殊的叙述策略和言说方式,建构一种新的权力和稳定关系,从而偷偷参与男性世界的话语权威建构。19世纪是小说兴盛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女性小说家。由于女性向公众直接讲述故事是不被允许的,因此女性作家只能用男性笔名作为掩饰来讲述自己的故事,从而维护权力与稳定性之间的平衡关系。小说《呼啸山庄》中大部分的故事主要是通过回忆由耐丽(Nelly)讲述。然而小说的第一个叙述层却是由洛克·伍德(Lockwood)构建一个叙述框架,面对“公众”讲故事。虽然耐丽是故事的主要讲述者,却只能私下对故事内的洛克·伍德讲故事,接受其“审查”,她的故事始终包含在男性叙述者的叙述框架之内。因此小说的第一个叙述层无疑可当作是一个男性面具,似乎读者读到的所有故事都是经过洛克·伍德筛选后的。因为女性并没有堂而皇之地向公众讲述故事,她的所有叙述都被包含在男性叙述框架内,从而显得无害。正如兰瑟所认为的那样,“当某种‘形

式’被认为不具有威胁性时,那么依靠这种形式传递的信息也就失去了威胁性。”^⑤同时,小说让耐丽来讲述故事,而不让两位男女主人公来讲述故事,也正是出于权力与稳定性的考虑。作为女性叙述者,耐丽彰显了女性声音的权力,然而耐丽同时也是所谓“正确”价值观的代言人。然而无可置疑的是,女性作家将她所有的激情、对人生自由、平等的追求在这一叙述框架下成功地投射到了希斯克里夫和凯瑟琳的身上。女性的观点和意义得到了表征,但是不得不将其作为男性权力的能指:洛克·伍德构建的叙述框架放在文本中的重要位置,从而形成一种稳定性。可见正如道利莫尔所主张的那样,虽然颠覆能被权力自身的目的所挪用,但颠覆一旦产生,也可以用来反对权力。^⑥

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都会在权力与稳定性中生产自己的意义,而不是轻易地诉诸暴力。在意义生产的过程中,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都分别维护了权力和稳定性之间的平衡关系,权力能指的缺场与稳定性能指的在场总是处在一种微妙的协商中,共同生产出双方的意义。当然有的时候,统治阶级也会采取暴力镇压,被统治阶级也会发动暴力革命。当这种平衡关系一旦遭到破坏,权力就不得不被重新分配从而重新建立起新的稳定关系。

莫里森在《天堂》中建构了两个世界:第一个是鲁比镇,这是一个几乎完全由黑人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用肤色来衡量一切,但与主流文化相反,这个世界以黑色作为衡量标准,以黑人认同的意义项为正项,肤色浅的成为标出项,而白人在这个黑色世界中更是成为为数不多的异项。可以说这个黑色世界就是白人世界的翻版,只是出现了标出项的翻转。在这个世界中,祖先的、男性的故事成为父权制社会无可置疑的官方史,而女性和新一代的声音则被边缘化和抹杀。小说中构建的另一个世界是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女修道院,这个世界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种族、肤色、阶级、年龄等。她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由于与黑人世界不同而成为了标出项。任何一种主流文化都要划出异类,边缘化他们,以捍卫自己的权力和主流地位;但任何文化中都要容忍标出项,从而达到权力与稳定性的平衡,维系社会稳定。然而小说中的黑色世界由于感受到女性世界的威胁,采取了极端的手段,完全消灭了这个代表异项的女性世界。失去了异项,权力与稳定性之间的平衡遭到破坏,正项与中项之间的联合因失去异项这个参照而被打破,正项所代表的主流价值所捍卫的权力也必然受到破坏。这样权力必须重新划分,因为只有原有的正项与中项中划分出新的标出项,才能恢复权力与稳定性的平衡。因此在女修道院消失以后,鲁比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只能听到一种声音,现在人们却对该事件产生了各种猜测与阐释,出现了各种声音。而代表该镇官方意见的摩根兄弟之间的关系也彻底破裂,从而象征着他们所代表的旧的社会秩序的崩塌。自此,那种维护单一父权制声音权威的人成为了异项,权力重新分配,社会恢复稳定。

结 语

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文化中的权力与稳定性是互为表里的。“社会政治标出异项,从而把非标出的各种意义立场组织成‘社会主流’。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社会的稳定,必须划出异类,必须边缘化异类,但又必须容忍异类。”^⑦小说作为社会权力和稳定性的表征,通过自己的体裁特点和言说方式,成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斗争的场所。它让统治阶级可以实现权力的再生产,也可以让被统治阶级挪用和改造统治话语。小说本身所具备的解构与建构权威的双重特性,使得任何一方掌握它都能够成为意义争夺的利器。

注释:

①②③[英]霍奇、克雷斯《社会符号学》,周劲松、张碧译,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第3页,第41页。

④王天保《伊格尔顿的文学意识形态论》,《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2期。

⑤Jonathan Dollimore, Alan Sinfield. *Political Shakespear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2.

⑥⑤⑥④⑤[美]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高原、董红钧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3页,第44页,第46页,第62页,第3页。

⑦赵毅衡《回到皮尔斯》,《符号与传媒》第9期,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

⑧[英]约翰·费斯克《英国文化研究与电视》,载《重组话语频道:电视与当代批评论》,罗波特·艾伦编,牟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4页。

⑨[爱沙尼亚]皮特·特洛普《符号域:作为文化符号学的研究对象》,赵星植译,《符号与传媒》第6期,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7-166页。

⑩⑪⑫⑬⑭[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第34页,第4页,第5页,第35页。

⑮⑯[苏]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第74页。

⑰⑱⑲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91页,第288页,第287页。

⑳Ira Konigsberg. *Narrative Technique in the English Novel: Defoe to Austen*. Hamden: Archon Books, 1985.

㉑Susan Lanser, Joan N. Radner. "The Feminist Voice: Strategies of Coding in Folklore and Literatur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vol. 100, No. 398, Folklore and Feminism (Oct. - Dec, 1987) p. 420.

㉒张昕《关于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意识形态功能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0期。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大学符号与传媒中心。本文系2014年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声音的权威:20世纪美国黑人女性小说叙述策略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4YJC752005;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美国奴隶叙事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3BWW066)

责任编辑 刘小波